

小说艺术

王阳 著

叙事学研究

形式分析

华夏出版社

911

1054
w38

小说艺术

叙事学研究

形式分析

王阳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王阳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ISBN 7-5080-2330-7

I. 小… II. 王… III. 小说-叙述-文学理论-研究
IV.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64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6.5 印张 436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符号逻辑与叙事学	(1)
第二章 “叙述者”界说	(24)
第一节 英美和法国的不同传统	(24)
第二节 一般用法	(32)
第三节 关键在“叙”与“事”的关系	(38)
第四节 “两个自我”的概念失误	(46)
第五节 限定“叙述者”概念的必要性	(54)
第三章 文本物质层面与叙述符号	(70)
第一节 文本物质层面的意义	(70)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有关论述	(71)
第三节 现象学家的论述	(78)
第四节 实证分析的有关论述	(89)
第五节 语言符号的物质层面	(99)
第六节 叙事学与文本物质层面	(103)
第七节 叙述符号	(113)

第四章	叙事文本的矢量方程	(128)
第一节	形式叙述者	(128)
第二节	矢量方程中的符号意义约定	(134)
第三节	矢量方程变换	(141)
第四节	矢量方程的二阶微分	(149)
第五节	矢量方程的系统论推导	(155)
第六节	模糊集合与实例分析	(161)
第五章	文本双层时空与受述者	(174)
第一节	阅读过程与文本物质层面	(175)
第二节	书面与口头交流语境中的叙述者	(184)
第三节	受述者	(196)
第六章	三重空间中的主体对称	(203)
第一节	主体的一般十位对称图式	(203)
第二节	两重交流语境及其主体对称	(212)
第三节	语言语境中的主体对称	(214)
第四节	三重交流语境的主体对称	(219)
第五节	非真实陈述的三重交流语境及主体对称	(226)
第六节	虚构交流语境的阐释功能	(230)
第七章	叙事人称和 S1 句型	(247)
第一节	叙事人称	(247)
第二节	S1 句型和第三人称叙事的视角限定	(255)
第三节	扩张的 S1 句型与矢量方程	(266)
第四节	叙事人称的逻辑对称性分析	(272)

第八章	真实文本与虚构文本的视角关系	(279)
第一节	“文史互证”的极限	(279)
第二节	初步分析	(285)
第三节	比较	(297)
第四节	小说中的真实成分	(305)
第五节	元小说的视角关系	(317)
第九章	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关系	(325)
第一节	第一人称叙事分析	(325)
第二节	第一人称叙事悖论	(330)
第三节	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与意义	(341)
第十章	第三人称叙事的视角关系	(360)
第一节	第三人称叙事的视角判定	(360)
第二节	第三人称叙事的矢量方程	(365)
第三节	实例分析	(371)
第四节	视角关系的现象学表达	(382)
第十一章	叙事学诸概念分析	(389)
第一节	叙述的时间	(389)
第二节	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	(399)
第三节	聚焦	(413)
第四节	声音和眼光	(416)
第五节	叙事人称和叙述情境	(425)
第六节	转述语和自由间接引语	(427)
第七节	叙述层变换	(432)

第十二章 小说文本叙述形式分析	(443)
第一节 《嫉妒》	(443)
第二节 《吉娜》分析	(455)
第十三章 诗歌文本形式分析	(471)
第一节 里尔克《豹》分析	(471)
第二节 普希金《УЗНИК》的另一种读法	(488)
第十四章 意义与形式	(504)
后 记	(518)

第一章 符号逻辑与叙事学

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上可以看到，历史上思想领域里的每一次较大发现，迟早总会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进而引发社会的变革。20世纪学术思想的发展呈加速之势，所获得的成果已超过以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人类思想成果的总和。以当代科学技术为代表的人的智力成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

本世纪以来曾发挥过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新思想为数众多，其中数理逻辑——符号逻辑所扮演的角色不能不令人格外瞩目。数理逻辑在本世纪迅速发展成为一门高度复杂的严格科学体系，还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专门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渗透，并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称其为“人类智力发展史上带有总结性的重大成果”[1] (P.1) 毫不过分。可以说，数理逻辑在根本性层次上对20世纪的学术走向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前为全球所高度关注的信息时代的来临，就是技术成就从深层次上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一个例证。其中数理逻辑对计算机科学的培育无疑是推动信息革命的重要一步。现代应用逻辑各个分支的蓬勃发展表明，符号逻辑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最为强大的工具，其前途仍不可限量。

然而，在文学艺术领域，符号逻辑的渗透却一再受挫。这门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弗雷格——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即对只有涵义而无指称的虚构艺术形象进行符号表达式描写 [2]。弗雷格表述的是莱布尼茨的理想，这一设想如能实现，用科学手段分析艺术作品就有了坚实的基点。西方哲学界权威刊物《亚里士多德》1933、1954两个专题论丛涉及过符号逻辑的真实世界与小说隐喻虚构成分的关系。符号逻辑学者们都同意，文艺作品中所展示的世界是“可能世界”，无论该世界的表现形态多么奇异，创造该世界的人

及其所使用的工具、所遵循的方法总是理性一般的，在那里才真正是“连魔鬼也必须合乎责任地行为” [3] (P.307)。想象世界的真切生动或怪异荒诞都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创造，想象物的奇异性正是人类想象力的理性外化，想象力的理性发挥正是艺术家创造精神的本质规定。正如胡塞尔说，“心中浮动者可能是一纯虚构；浮动行为本身，此虚构意识，本身不是被虚构的，而且它的本质以及每一体验正包含着进行知觉的和把握绝对事实的反思的可能性” [4] (P.127)。我们只能在理性正常的范围内合乎逻辑地运用想象力，正如我们只能逻辑地思考和评估想象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逻辑是先天的，其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思考 [5] (P.69)。”想象世界即可能世界。太阳从西边升起的世界，人永生不死的世界，神仙魔鬼变化出没的世界，都不过是符号逻辑的可能世界；甚至于 $3+2=5$ 又 $\neq 5$ 的世界，“圆的方”存在的世界，逻辑不可能的想象可能世界或语言可能世界，即斯宾诺莎所谓“语词上的存在物” [6] (P.141)，其生成的背景和依据也在于可以被逻辑地说明的想象力和语言的性质。换言之，在文艺作品中的可能世界的背后，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作为更根本的东西客观地存在着。对这一根本规律的外在形式进行严格刻画是获得正确认识的第一步，也是文论家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发展似乎为追求这一目标准备了可靠的工具。但是从罗素起，一直到奎因(W.V.A.Quine)、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塞尔(J. R. Searl)，符号逻辑学者都一致认为，逻辑语言不可能指称虚构的和想象的对象。这在文学上就是著名的小说中的语言指称难题。

1972年戴维森(Donnald Davison)和哈曼(G. Harman)合编的《自然语言语义学》(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Dordrecht: Reidel, 1972.)显示出分析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倾向。按照弗雷格的立场，文学文本的句子既不真也不假，因此引入三值逻辑应该是逻辑语义学的题中之义。道勒策尔(Lubomír Dolezel)后来认为，1978年以后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理论三家一起注意形式语义学始

于此书。他说：

一方面是语言学的文本语义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哲学的逻辑分析，两者的结合展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前景。在我看来，这一跃进式发展是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趋势。
[7] (P.7)

道勒策尔的《捷克文学中的叙述模式》于1973年发表，1976年他的另一著作《叙述模态》(Narrative Modalities)借用了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模式[8] (P.129-151)。这一时期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帕威尔(Thomas G. Pavel, 1976)的《文学语义与‘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 in Literary Semantic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XXXIV/2, 165-176)和《诗学中的存在论：语言行为理论与小说世界》(Ontological Issues in Poetics: speech Acts and Fictional worlds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0:167-178. 1981; Fiction and the Ontological Landscape, 1982), 夏朵(Dominique Chadeaux, 1976)的《叙事语义学》(“La semantics du recit”, Semiotica 18, 201-216)海因茨(Joe Heints, 1979)的《小说中的指涉和推理》(“Reference and Inference in fiction”, Poetics 8, 85-99)等，从此以后模态逻辑和语言行为理论的术语和概念逐渐被引入叙事学。马尔戈林(Uri Margolin)认为“可能世界语义学并没有对个体可能拥有的非真实领域中的性质和关系的种类划定前进边界”，“一般而言并没有这样的逻辑要求，对被发明出来的个体与存在逻辑的规律式样要达到一致”[9] (P.7-11)，因此有“非真实领域中自由语义构造”之说[9] (P.14)。最近奥若兹(Magdolna Orosz)把文化看作一个大的文本，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研究文化现象，得到了一些计算式。他认为“抽象的叙述模式层面可以翻译成可能世界理论的术语”，“故事建立在抽象的语义层面之上”，“话语层面由诸可能世界的实际组织决定”[10] (P.409)。莱安提出“叙事学在可能世界理论的框架下工作”[11] (P.118)，她认为分形几何可以描写

“mise-en-abyme” (故事套故事), 数学上的简单递归函数可以将微小的叙事单位归结到较大的画面中去 (因为每个单位的结束都返回第一叙述层), 阻止递归的极限成分恰好表明“叙述者” (其实是“形式叙述者” [12]) 的变化和新的言语行为 [13]。莱安还具体研究了“窗口结构”、“叙述者和受述者的形态”等。这一努力尚未产生最终成果。实用上的困难不仅在于用真值表来刻画文学意义必然导致的有限性, 还在于文学文本的内涵语义特征似乎有抗拒理论的清晰概括的天然倾向。其他学者如埃科 (Umberto Eco) 也一直致力于将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与文本符号学尤其是叙事学联结在一起, 还引入了现象学的“意向语义”等概念来加强语义分析 [14][15][16]。莱安认为“虚构叙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她把叙述的意义世界称之为“文本实在世界” (textual actual world), “在该世界是读者想象活动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说, 内含于文本的潜在世界, 其给定的信息能够被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在生动的心灵表现中化为有血有肉的世界”, “可以用潜在的虚拟过程来刻画叙述本身的存在模式”; “任何‘叙述语法’……都必须包含将决定故事发展的事件和情况的存在模式具体化的操作者” [11] (P.113-141, 117-118)。著名叙事学家普林斯概括说:

莱安不仅表明一种令人满意的情节模式, 必须描述事实上的叙述世界 (故事中的真实世界) 中的既定构成同人物的私人世界 (依赖人物的知识、愿望、感受、伪装、意图、幻想等方式实在地嵌入叙述) 的构成之间的关系变化, 她还论证说并非所有的情节都是同等的, 叙述性置根于这些变化的结构之中, 特别是在实在领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之中。 [17] (P.80)

普林斯还使用了“叙事语义学” (narrative semantics) 这个词 [17] (P.80)。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的虚构存在应当能够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框架内, 在“现实”存在论意义上被形式化, 该世界的存在标准及其语义结构仅仅由叙述操作决定。但是,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离

弗雷格的理想都还很遥远。

这一方向的进展国内文论界似乎从来未见译介，符号逻辑的普通规则和术语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至今仍为稀有之物。大力提倡现代文论转型的论著中什么学派的新名词都有，惟独没有形式化方法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踪影。这也许同我国教育传统有关：历来文论界的中坚力量基本上不懂得数理逻辑，甚至不懂数学。分析哲学的方法就这样被隔离在了我们的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于是，当德国教授顾彬(W·Kubin)在北大讲学时企图用初等数学的圆方程来比照诗歌意义生成结构[18](P.174)，立即遭到了怀疑。王宾说：“以基于逻辑的数学公式来分析汉语言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蕴，其有效性我一直持怀疑态度 [19] (P.22)”。如果这种怀疑在现代应用逻辑的范围内提出，那可以严肃地深入讨论，否则怀疑的思路本身没有价值。顾彬的意图不过是想对文本内的诗性空间作出意义相关描述，即在“确定的空间”中用几个“描述点”来把握一件“艺术作品”[18](P.174-179)，并未涉及审美意蕴本身。顾彬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如何将审美意蕴数学化，而是如何用数学方程的无穷变化去探究诗歌意义的潜在结构，同时避免在直接的比较中让主观随意性渗透进来，如此而已。

力图跟上国外进展的国内研究者有董小英、郑刚等。董小英从叙事结构出发自制一套符号[20]，郑刚从数理逻辑出发提出一套自成体系的定理[21]，两人都企图迫近弗雷格的设想但均尚未有突破。自制符号不是符号逻辑或任一形式系统所要求的符号化。缺乏符号化机制的符号系统与其说是对研究对象的形式描述，不如说是对认知者主观过程的描述；从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看，这套符号与符号学理论全然无关。自成体系的定理则与其说是对一般认识范畴的描述，不如说是对其自身可推导性的追求；这些定理同它企图剖析的诸传统范畴之间实在太过于隔膜。看来，探索者们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与上面这些宏观讨论不同但一样重要甚至更令人关注的，是一

些技术专家们的工作。除计算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和范畴语法之外，计算机科学家们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工作虽然离弗雷格设想的最终目标还很遥远，但他们在技术性细节方面的进展更令人鼓舞。例如语义与视觉形象集成模型的研究，即让计算机阅读文本后输出（理解后的）相应图像，就是在严格的数学化基础上展开的[22][23]。语义与视觉形象集成模型由公认为最具有挑战性的两个领域引出：一个是自然语言处理，另外一个计算机视觉。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具有国际规模的竞争热点，属于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从这一纯科学领域跨入诸人文学科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可以期待由此促成意义理论的新突破。例如，可以将杜诗“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译为计算机语言[24]（P.442）：

$$Bt(P^4(x) \wedge Q(x) \wedge Bt'(R^{\frac{1}{4}}(x) \wedge S(x)),$$

此时并未触及到“艺术形象”，也未迫近“意境”所包含的感性直观信息，还算不上是对“可能世界”的文学意义上的描写。上式中 $Bt(x)$, $t \in (0, 1)$ 是“美化算子”，同类算子还有比喻算子 $Au(x,y)$, $u \in (0, 1)$ ；联想算子 $Fv(x \rightarrow y)$, $v \in (0, 1)$ 等。这些算子可以作为指令规定计算机翻译的程序，是人们用符号表示和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计算机的启发编程建立智能模型的语言处理方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算子中所涉及的模糊集合，其具体赋值需要划定阅读理解的合理边界，这一点与所谓的“审美自由主义”天然敌对。虽然据此形成一种形式化、公理化的文论的可能性尚不清楚，但毕竟有了一线曙光。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文学研究者似乎无力过问这方面的进展。

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在直观和常识中的表现远远超出了目前最快的机器的效率和处理水平，这正是令脑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着迷之处。自身限定为求真的符号逻辑，显然还不能对远不止于“求真”的一般精神活动作出规范解释。于是，精神领域仍然留给了精神自

身，留给了传统的以思辨方式把握自身和对象的诸学科，包括各种各样的文论。想要借助符号逻辑来处理文本的何止一家，尤其是注重形式分析的各派，但是实施起来总是困难重重。

困难主要来自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符号逻辑的主要旨趣在严格性和求“真”，其注意力一直在思维推理的形式规律方面，对于主体方面的情感、意图、个性、偏好等等可能干扰认识的客观性的东西进行了先期的排除。也就是说，符号逻辑是从外延方面来入手来建立体系的。文学作品内恰恰缺乏外延方面的客观规定性，并且往往由于内容的虚构性而被视为“无指涉”的语言构造。加之作品价值与作者的创作个性、想象力、具体生活经验以及主观心理特征密不可分，对作品进行严格的逻辑刻画一开始就不甚可行。以色列的罗恩认为可以用文本游戏取代叙事学模式下文本话语的真值条件[25]（P.19），如此等等思路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二，符号逻辑的方法即符号化、形式化、公理化所处理的对象都具有命题一般关系的高度抽象性。文学作品的意义丰富性所抗拒的正是不变的规范和一般抽象性。文学作品不由命题联结而成，而由具体、个别、特殊的现实性或者精神性的图画构成。由于精神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对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创造性精神活动规则的任何描述，都是局部的和不完善的。例如，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分离出31位功能，托多洛夫确定动词的3种句法意义，格雷马斯提出6个行动位范畴，罗兰·巴特区分功能与标志以建立分析系列，如此等等都是形式分析方面的极有影响的成果，但是都只能在“故事”的小范围内成立，在抒情诗和戏剧中就难以成立。格雷马斯深信“行动位的数量由意义理解的先验条件决定”[26]（P.77），但他的模式在对非情节化的现代派作品进行形式描写时无效。如何对文学语言文本进行一般的描写，这是建立文学叙事的深层语法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三，文学作品中的那个想象性奇异世界的形态和构造，以及

其表现手段、话语意义，无论在作者的构思意图方面还是读者的感理解方面，都是高度分化的和不可观测的。这首先就同客观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可重复观测验证的不易前提相互矛盾，也同一般符号化的方法相互矛盾。在杜威那里，“科学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方面都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是有关于艺术的事情”[27]（P.242），科学和艺术的区别只不过是经验内部实践方式的区别。科学是艺术中的理性要素，同一的经验描述应该不成问题。但“艺术有两个终端界标，一个是常规，另一个是无规律冲动”[28]（P.66），“无规律冲动”使得对文学作品内的虚构世界做一般抽象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符号逻辑不能介入这类冒险。

第四，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所表现的东西依赖于作品中语言工具的使用和语言运作的方式，语言传达技巧的个性化导致的细微意义差异无限丰富，难以进行一般的剥离。“艺术性”、“创作个性”体现于语言个性形式与所传达的内容的相关性之中，连规范语法和修辞理论都还不能对此作出一般解释。符号逻辑也关注语言并导致过“革命”（乔姆斯基），在某种意义上说符号逻辑与语言哲学是一回事，都是主导西方整个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的急先锋。但符号逻辑关注的是静态的结构、一般规则和有效性等等，而非个别表达中的差异成份，实际上与语言的“艺术层面”不相干。经验性的文学理论和形式化的符号逻辑，二者的语义概念何止天壤之别！于是，语言哲学将语言艺术留给了成功或不成功的诸种类的美学和诗学，或者说语言艺术被语言哲学遗弃了。

第五，从文论方面看，各种创作主张和理论体系之间对文学的理解从未成一致，哪怕是在现实主义文论内部，“真实性”与“主观能动作用”之类对立范畴也一直在不断变化、争论不休，这一点迥异于逻辑学和一般科学依据范式的对系统性、规范性、客观性和范畴纪律的共识。符号逻辑的语义学在真实世界中以人类全部科学知识作为其后盾，但从未将文论纳入其同盟，这一点颇耐人寻味。本来，文论中的形式分析学派与符号逻辑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形式分

析本身的历史取向及其难度使得它不断地被排挤至文论的边缘地带；主流文论则往往标榜自己的特殊性而对抗数理逻辑的入侵。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形式分析同数理逻辑结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加深了整个文论与数理逻辑乃至全部自然科学的隔膜。

第六，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关联于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状况，作品和相关文论都是对不同民族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因子的强化而非超越。符号逻辑强调的正是超越。由于文学中“行动、环境等……是用文化信码而非形式逻辑来定义的”[29] (P.12)，文学与符号逻辑就成了在不同方向上自足的两个独立无涉的领域，其间插入了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诸人文学科。这些学科成为文学与数理逻辑之间的广阔隔离地带甚至于一种自觉的取代力量，阻止文学逃逸出这些学科的解释权限去与符号逻辑接近。

上述六个方面的困难一直限制着形式分析企图依照符号逻辑的思想和方法去追求“客观性”的实践操作，越过较为近便的诸人文学科而直接借用符号逻辑的强大武库成了追求“科学性”文论家们的遥远理想。早期形式主义诸学派在诗歌领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掘，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英美新批评派一开始就把语言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用法区别作为研究的重心，这样与其说是接近不如说是疏远了甚至背离了弗雷格的设想。同样企图抵达客观性彼岸的法国结构主义，则在其符号化和形式化起步阶段就举步维艰，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此形势下，非形式化的和反形式主义的各种方法，例如对文学的社会学、历史-美学处理，以及传记批评，考据学，主题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现象学文论-意图批评（日内瓦学派），比较文学和本文人类学等等，则在不同的方向上追求自己的科学性目标，淡化了接近符号逻辑的意愿。六十年代后，随着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相继失利，各种相对主义色彩甚浓的文论便有了嘲笑“科学性”的口实，“理性局限性”成为时髦的提法，符号逻辑与文学的相关性不再是论题。尤其是对“客观性”

有着特殊理解的印象式批评、审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化论、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直觉主义等等在“反中心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一时形成较大的声势，“科学性”几乎成了贬义词。并不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文学者也断言“科学如今与社会进步的距离拉大了，前沿科研领域（诸如量子论等）呈现出规律反常，验证证伪，前后矛盾，中心消散等大量非稳定随意状态”[30]（P.406），似乎科学自身正处在朝不保夕之中。这种通俗小说当中的笔法确实有“振聋发聩”之功效。事情并不像法国学者B.安德里耶说的，“对科学的批判，正如对科学的质疑一样，仅仅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引进的批判的认识论”[31]。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批判似乎演变成了对科学本身的攻击。

文论中科学描述的企图也受到反驳，理由是“任何描述都是对事物的性质的歪曲”，因此“没有一种比其它系统更好或更自然的意义导出系统”[32]。照此说来任何人都能够得出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哲学家同等深刻的认识，甚至任何胡言乱语都具有同等的哲学理论价值。

就在嘲弄科学的风气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注意：作为结构主义文论的一个次要分支的叙事学，以其形式化程度较高而接近于符号逻辑，并且它本身就属于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叙事符号学”，其理性主义追求极为鲜明，竟然能够在恶劣的反对“理性局限性”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目前的叙事学虽然还算不上“热”，但其追求客观证实性的宗旨甚为鲜明，可以视为对上述“奇怪现象”的一个回应。

让我们再回头审视一下。

当法国结构主义者以理性主义为旗帜对存在主义发动攻击，大陆现象学也在积蓄力量准备向全球扩张，以求洗刷存在主义这一不肖子孙给现象学带来的耻辱。此时英美新批评正如日中天。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吸收了当时最重要的现象学文论家英加登的思想成果，这一事件似乎表明，理性主义各派结盟的时代已经来临。